

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比喻

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

□ 王丛霞

2013年5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要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观念。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

雷池乃古代地名，在今安徽省望江县东部。据庾亮《报温峤书》记载，东晋咸和二年（327年），历阳（安徽和县）镇将苏峻叛乱，举兵进犯建康（南京），江州刺史温峤欲领兵东下，中书令庾亮恐荆州刺史陶侃乘虚而入，在《报温峤书》中说：“吾忧西陲，过于历阳，足下无过雷池一步也。”命令江州刺史温峤要坐镇防地，不要越过雷池去京都。“雷池”现在通常用于指代某一范围、界限。习近平总书记用“不能越雷池一步”的比喻，强调必须牢固树立生态红线观念、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生态红线就是不能越过的“雷

池”，生动体现了“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生态文明真谛。

树立生态红线意识是“不越雷池”的前提。“生态保护红线”是继“18亿亩耕地红线”后，另一条被提到国家层面的“生命线”，是指在自然生态服务功能、环境质量安全、自然资源利用等方面，需要实行严格保护的“空间边界”与“管理限值”。正如一旦越过“雷池”，便会遭到严重惩罚；“生态保护红线”一旦蹂躏，必然会付出惨痛代价。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生态保护红线工作，多次在讲话中提及生态保护红线，为划定和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根本遵循。他指出，生态红线的观念一定要牢固树立起来。要精心研究和论证，究竟哪些要列入生态红线，如何从制度上保障生态红线，把良好生态系统尽可能保护起来。列入后全党全国就要一体遵行，决不能逾越。

落实生态红线制度是“不越雷池”的保障。目前，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调整工作基本完成，超过25%的国土面积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覆盖了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以及生物多样性分布的关键区域，力求实现一条红线管控重要生态空间的效果。“令在必信，法在必行”，不打折扣、不作选择、不搞变通地让生态红线制度成为刚性约束，健全生态保护红线法律法规与标准体系，完善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制度、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才能有效防范“越雷池”的不当行为，确保重要生态空间的生态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促进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

守住生态安全底线是“不越雷池”的目的。生态环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从历史上看，我国黄土高原、渭河流域、太行山脉等地区因为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相互作用导致生态环境破坏而经历过惨痛教训。从现实上讲，腾格里沙漠污染、秦岭违建别墅、祁连山生态环境破坏等反面典型及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近些年来发生的违背自然规律、“越雷池一步”的短视行为，不仅带来生态环境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系统功能退化等潜在的生态环境风险，也不同程度的反映出地方政府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假作为等问题。实践证明，只有遏制“越雷池”而盲目发展的冲动，把握资源开发利用的“度”，守住自然生态的安全边界，才能守住生态安全底线。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文明得以延续的前提。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不能越雷池一步”，就是要严格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在为自然守住安全边界和底线的同时，正确处理发展与保护的关系，不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确保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为可持续发展留足空间，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家园。

吴景超（1901—1968年），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曾担任过南京金陵大学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也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倡导工业化、都市化的先驱人物，其著作《四种国家的出路》《中国经济建设之路》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道路作出了独到而深刻的分析。他的治学有两个最鲜明的特点：一是“世界眼光”，即讨论中国问题时参考世界范围内的大量经验；二是“历史方法”，即为增加对现实状况的理解，而不时地从历史文献里归纳社会学的通则。

在世界范围内搜集事实研究中国问题

1928年9月初，吴景超任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主任。这时，有人和他说道：“你们教社会学的，真是容易，跑上讲台去，随便吹一下就是一点钟！”吴景超听后颇受触动，9月15日便写了《社会学观点下之社会问题》一文，回击这种偏见。他强调社会学者是以科学的态度研究社会问题的：研究的第一步不是空谈，不是臆说，而是搜集事实；还要对事实进行分类，作有系统的叙述和解释。他指出，社会学者始终不能离开事实，“离了事实，他便不是科学家，等到事实已经解释清楚，科学家的职务，便算成功了”。

共同富裕路上 一个也不能掉队

——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 高莉娟

重读经典 新时代重要文献选读

《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1月27日的讲话，收录在《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这篇重要文献提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总体要求，发出“两不愁三保障”“两个确保”“六个精准”“五个一批”等重要指令，吹响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对于新时代新征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

共同富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扶贫开发事业始终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根本方向，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坚实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扶贫工作，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突出位置。他指出，如果贫困地区长期贫困，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群众生活长期得不到明显提高，那就没有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也不是社会主义。2012年12月，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15年，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脱贫攻坚到了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必须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向贫困发起总攻，齐心协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对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必须实现，而且必须全面实现，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在讲话中，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从巩固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从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高度出发，做好脱贫攻坚工作。在脱贫攻坚过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立足我国国情，把握减贫规律，出台了一系列超常规举措，构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制度体系，使贫困地区不仅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而且整体面貌发生历史性巨变，脱贫攻坚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就是要为民造福，而只有做到为民造福，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才能坚如磐石”。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坚持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团结带领人民，为创造美好幸福生活进行了接续艰苦奋斗，赢得了民心，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我们坚持党的领导，为脱贫攻坚提供坚强政治和组织保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形成脱贫攻坚的共同意志、共同行动；坚持精准扶贫方略，用发展的办法消除贫困根源；坚持调动广大贫困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脱贫内生动力；坚持弘扬和衷共济、团结互助美德，营造全社会扶危济困的浓厚氛围；坚持求真务实、较真碰硬，做到真扶贫、扶真贫、脱真贫。

精准扶贫充分彰显我国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看待脱贫问题，把扶贫开发工作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任务、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等问题，就扶贫工作提出实现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的“六个精准”，实行发展生产、易地搬迁、生态补偿、发展教育、社会保障兜底“五个一批”等重要论断。科学扶贫、合力扶贫、内源扶贫等精准脱贫思想，深刻总结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创新实践和主要经验，有力贯彻了新发展理念，充分发挥了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守正创新了中国治贫之道。

经过8年持续努力，我们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960多万贫困人口实现易地搬迁，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取得了重大历史性成就。农村居民收入明显增加，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脱贫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大踏步赶上，脱贫群众精神风貌焕然一新。

精准扶贫基本方略，不仅在理论上彰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全球贫困治理提供多样化的解决方案，而且在实践中通过开展国际减贫合作，履行推进减贫国际责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与话语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及其实践，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开拓了世界扶贫的战略视野，具有巨大的世界意义。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

伴随着10年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新时代脱贫攻坚伟大成就为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供了重要支撑。但我们

也清醒认识到，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仍然任重

一张卡片只能记一种资料

——社会学家吴景超的治学之道

□ 吕文浩

吴景超借鉴美国社会学家孙末楠（William G.Sumner）的治学方法。孙末楠强调做学问要围绕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搜集最丰富的证据，并加以简明清晰的叙述和解释。孙末楠去世时留下52箱资料卡片，每箱约有3000张，正是在如此坚实的基础上他才写出不朽名著《民俗论》。吴景超感叹：“我们读过他那本《民俗论》的人，看到事实之后，还是事实，最后才来一两句结论，便没有不相信他所说的。”孙末楠的研究多用民族学材料，他为了搜集最丰富的证据，学过很多种外国语言，而且除了希伯来文、希腊文、拉丁文、法文和德文以外，其他各种都是在45岁以后学习的。以孙末楠为楷模，吴景超青年时期就掌握了英文、德文，后来为研究苏联的经济建设经验，又自学了俄文。他大量阅读西文文献，从英国、美国、德国以及苏联的经济建设经验中取得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讨论中国经济建设的问题。这种在世界范围内搜集资料，始终在世界格

局中讨论中国问题的学风在那个时代实不多见。从英美那里，吴景超看到了以发展民生工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性；从苏德那里，他看到了后发国家必须先图强后致富，迅速建立起自己的重工业体系，特别是军事工业体系。正是由于具有这种世界性视野，他将当时流行的种种只强调农本政治的论调，归之为“经济上的复古论”。在他看来，无论要克服多少困难，中国都应尽快迎头赶上工业化、都市化的世界潮流。

吴景超有自己的一套完整的借助卡片科学搜集资料的办法。他每天把读书读报所得资料，分门别类地做成卡片，每天所录资料不少于3000字，数十年如一日。他多次强调一张卡片只能记一种资料，为的是方便对资料进行分类、再分类，这样，排比卡片便能发现问题，“卡片可以解放我们的记忆力，使我们可以把精力多用在分析及思考上面”。1955年，他把自己做卡片搜集资料的经验写成《关于搜集资料问题的几点经验与教训》发表，文中再次强调，做教学工作必须掌握一定数量的资料，做科学研究工作则必须要在大量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概括。

对世界范围内工业化国家发展经验的广泛了解、搜集丰富的各国统计资料，是吴景超形成“放眼世界、着眼中国”学术特色的重要基础。他的弟子费孝通就曾说，“我要查历史知识潘光旦先生，要查各国情况、社会统计就找吴先生。这种治学精神，我们这一代很少人能真正继承下来”。

发挥历史法对社会学的独特价值

吴景超在社会学研究方法中兼收并蓄，使统计法、个案法和历史法都能在研究中充分发挥作用。他的很多文章广泛运用统计资料说明问题，给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数字和图表随处可见；他的博士论文《唐人街——共生与同化》是运用个案资料进行分析

档案中搜集材料，重点研究了汉冶萍公司、象鼻山铁矿、安徽砂公司、龙烟铁矿以及筹建未果的国营钢铁厂等几个企业失败的教训，他说：“我深信这种研究，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它告诉我们以前走错的路，以后不要再入迷途。”他将这些研究写成了一组文章发表在《新经济》半月刊上，后来收入他的著作《中国经济建设之路》中。1942年，吴景超耳闻目睹官僚资本横行，愤然发表了《官僚资本与中国政治》一文，从西汉的史料中分析出中国官僚资本形成的6种形式，这在官僚资本家占据要津，资料获取和成果发表都面临困境的情况下有着特殊的尝试价值。这些成果为中国社会学研究增添历史的纵深感，更深入揭示了中国社会的独特性。

梁启超认为，中国社会学有两个不可偏废的研究对象：“现在的情形”和“历史的事实”；前者靠实地调查，后者虽不及前者切实，但“现在的社会状况，不是偶然发生的，全由历史演出”，仍有其不可取代的重要性。吴景超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就是为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现实状况而采取的一种有效路径。

